

林蔭下教育：新界和離島學校的故事

昔日鄉村學校遍布新界和離島，為農村和漁村的學童提供基礎教育。隨着城市發展和時代變遷，村校由戰後高峰期的八百多所，到如今僅餘不足二十所，並以不同的轉變，配合辦學和教育的需要。

力瀛書齋（又稱力瀛書院）是香港地區已知最早的書院，由錦田鄧氏祖先鄧符（字協）於一一〇六年至一一一〇年間建立。早期的書院、書室、書塾等多以名士學者為中心，從一些祀賢祠演變而成，既是讀書的地方，亦兼具祭祀先賢的功能，主要是幫助學子通過科舉考取功名，光宗耀祖。

儘管新界地區在一八九八年納入港英政府管治，但因港英政府早期對新界採取不干預態度，新界傳統書塾的教育模式和功能最初並沒有太大變化。其後，當清政府於一九〇五年廢除實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舉制度，培養備考科舉人才的新界傳統書塾地位受到嚴重衝擊。幸而新界的教育事業並未止步，書塾在傳統的「四書五經」課程中，加入珠算、尺牘等應用科目，以滿足當時社會需要及幫助鄉村子弟學習謀生技能。一九二〇年代初，中華民國北洋政府推行「壬戌學制」，隨後更規定小學需要教授十二個科目，內地學制變化因而促成了新界書塾的轉型。一九二六年，大埔官立漢文師範學校成立，為新界學校培訓老師。接受新式師範教育的老師逐漸取代舊有塾師，而書塾也從名字、教學模式等多方面轉型成今天的「學校」。

二戰後鄉村學校發展迅速

二戰結束後，國共內戰接踵而至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，鄉村學校發展迅速。到了一九八〇年代，香港出生人口逐年下降，加上部分新界村民移居，適齡學童人口不斷減少，影響生源。此外，一九八〇年代新市鎮發展，設有二十四所教室的標準校舍陸續建成，令鄉村學校日漸式微，可幸仍有不少成功變革，繼續在新界各區作育英才。

早期新界學校主要承襲書塾傳統，大部分校舍借用祠堂地方或兼作祠堂之用，小部分則由村民集資興建。隨着時代變化，新界分別發展出由傳統氏族、宗教團體、同鄉會、業務社團、個人或民間組織興辦的各類學校。

香港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中轉站，享有水運之利，吸引中原氏族南來定居，例如錦田鄧氏、新田文氏、上水廖氏等。宗族興辦的鄉村學校獲本族大力支持，除撥出田地興建校舍外，更提供不少設施。港英政府接管新界後，西方傳教士紛紛到新界各區，開展傳道及教育工作。至於在新界和離島辦學的本地團體，則有新界農工商業研究總會（新界鄉議局前身）、香港東莞同鄉總會、長洲漁業聯合會等，照顧不同背景學童的需要。

眾多歷史悠久的新界和離島學校參與及推動區內教育發展。在保存本地傳統文化方面，不少由氏族、鄉村和同鄉會開辦的學校，將教育與鄉村節慶互相結合，讓學生通過活動了解和感受傳統習俗及其歷史意義。

教育與鄉村節慶互相結合

一些學校會將節慶日子訂為學校假期，讓學生參與慶祝活動。上水金錢村何東學校將每年大王福德寶誕正日（農曆正月二十日）訂為假期，讓師生能夠參與村內全年最熱鬧隆重的節日。部分學校更借出校舍作為慶典場地，好像長洲國民學校於每年正月十五元宵節，借出校園舉辦敬老及新春燈酌，聯誼島上街坊與鄉眾。

此外，不少由氏族開辦的學校更鼓勵學生參加本族的祭典，讓子弟不忘祖訓，學習慎終追遠的傳統美德。元朗新田惇裕學校由文氏所創立，因此每年的文氏青山省墓都是該校的重要活動。而廖氏祭祖亦是上水鳳溪小學畢業生的共同回憶，即使畢業了半個世紀，校友對廖氏秋祭的省墓歌，依然印象深刻。

（註：本文由《香港志·教育卷》專家小組組長、香港教育大學李子建教授、鄭保瑛博士及鄧穎瑜女士合著。因出版格式所限，參考資料從略。文中內容純屬筆者個人意見與觀點，並不代表香港教育大學及其立場。）

鄭保瑛博士、鄧穎瑜女士、李子建教授香港教育大學「香港教育故事」叢書系列共同主編

####

■由鳳溪學校學生組成的秋祭省墓隊伍。約攝於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。(圖片來源: 廖駿駒先生)

■金錢村何東學校楊松華老師和學生在宗福學校前合照。攝於二十世紀上半葉。(圖片來源: 金錢村何東學校)